

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著录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读后

张懋铨

西安的疫情稍微缓和不久,收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惠赠《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虽然我因年事渐高,从前年初开始就已经停止写作了,但是,当我祖祖将十卷书籍浏览后,还是忍不住想写上几句。

十几年前,我就听天进教授说他在整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当时我是惊喜参半。惊的是处于“青铜器之乡”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太有名气,作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青铜器为单一藏品的博物院,青铜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天下所熟悉。而且近半个世纪以来,出过的有关宝鸡青铜器的图录也不在少数,如今重新向大家介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吗?更何况作为一个博物院的藏品,并不是一个地区的出土物,前者不如后者系统和全面,甚至有点散乱,如何将年代不同、出土地点相异的上千件青铜器协调在一起,让这些面目已旧的器物重现辉煌?总之,困难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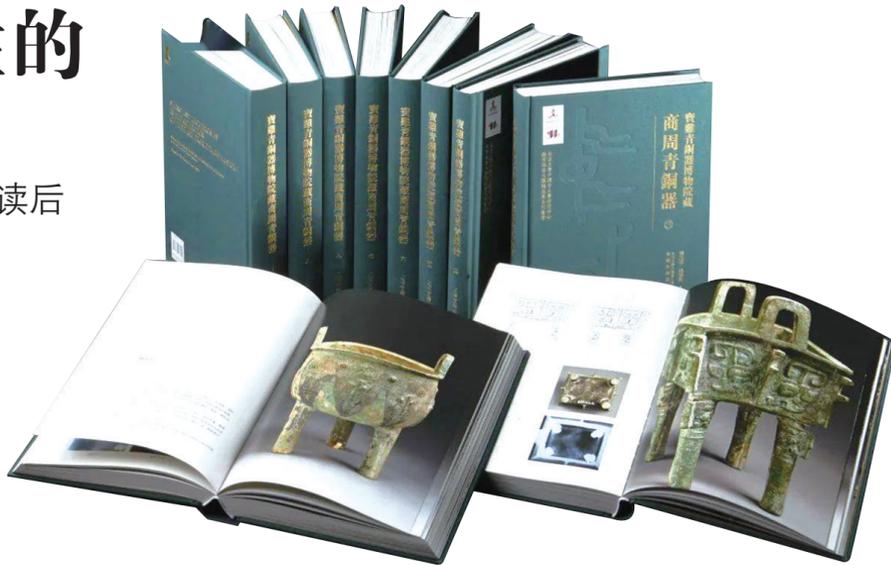
不过,我还是怀有希望。天进教授作为中国商周考古研究领域的翘楚,为人做事常常显现出卓尔不凡的一面。40年前,他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时,对宝鸡青铜器就很感兴趣,而且40多年来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宝鸡地区做田野发掘和考古研究,对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有深入的洞察和独到的见解,撰写不少论著,成果斐然。由他来主持做这个项目,自然是个睿智的选择。

如今我看到十大册图书,很兴奋,这果然是一部超前的大型青铜器著录书,在照片的拍摄、文字说明、研究文章的选择等方面都与众不同,新意迭出,令人欣喜。

首先,照片数量多。一般图录通常只有两张,一张正视图和一张线图,但是《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则完全视研究之需,多数数十张。譬如第一件青铜器是弦纹鼎,照片正视图和线图各一张,还有器底俯视图和线图各一张,还有一张底部X光片,重在显示器底范线等铸造痕迹。令人感慨的是,所有照片都非常真切。相比一般的图录希望将器物的华美展示出来,将欠缺的部位尽可能地掩饰,本书对青铜器没有做任何修饰,甚至显得有些粗犷,包括浇注不足,补铸的部分和痕迹,偏斜的器耳,器表刺状的凸起,烟痕痕迹,都清晰地体现出来。不仅仅谈青铜器的闪亮宝贵的一面,还要谈有缺陷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反映出青铜器的本色,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次,文字的数量和内容多。以往的青铜器图录的说明文字包括:器物编号和年代,出土时间、地点,尺寸大小,形制和纹饰的特点(有铭文的再加上铭文文字或内容介绍)。文字数量不会很多,一般来说只占页面的三分之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器物的文字数量很多,不少器物的文字占页面的一半,甚至达到三分之二。除了具有出土年代、地点、尺寸等信息外,特别介绍器物以范线为主的铸造痕迹,如加强筋、芯撑、烟痕等。在说明文字里,除了一般图录常见的通高和口径的记录,还有容量和重量的说明,体现出高质量的专业水平。近年来不少图录书籍的说明既无容量也无重量,不清楚容量和重量对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意义,很遗憾。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运用综合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研究宝鸡博物院所藏青铜器。一是从地理形势和历史背景的角度,有李零教授的《西周的后院与邻居——宝鸡和宝鸡周边》。作者从夏、商谈到西周,特别强调了西周在三代的重要性;地域从中原谈到宝鸡,展示了宝鸡地区的重要性。从时空范围讲了包括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所藏青铜器的年代、族属、姓氏,从而很自然地将其融合为一个亮点,让原本看似散乱的宝鸡青铜器形成一个整体。

二是从考古的角度,有徐天进、近藤晴香、刘静写的《铜器内外——宝鸡博物院藏青铜器的几个问题》。鉴于这些青铜器多有出土地点,作者力主院藏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和田野考古发掘并行,从而讨论了青铜器的空间分布与聚落的关系、西周时期宝鸡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青铜器作坊和铸造工艺等问题,使得青铜器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讨论空间。

三是运用更多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强调从铸造工艺方面来分析青铜器的整理和研

究。本书在这方面颇有建树。汪海港、金正耀、徐天进等学者的《周原遗址和国墓地出土青铜器成分、金相及铅同位素分析》,还有朱博雅、胡东波等学者的《X射线成像技术在宝鸡国墓地青铜器研究中的应用》,都充分体现出科技手段和方法研究宝鸡地区青铜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总而言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全面、深入整理和综合研究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所藏商周青铜器,形成了新的风格,是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著录,必将对今后的青铜器整理和研究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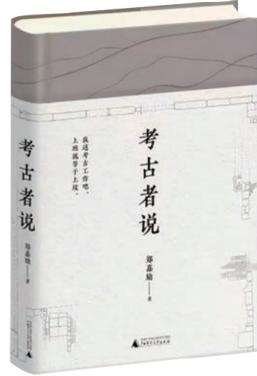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全十册) 编著: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主编:徐天进 段德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1月 定价:9800元

考古风华的别样叙述

——读郑嘉励《考古者说》

安正辉



郑嘉励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因为一句“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是上坟”,而被很多人视为“段子手”。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大概与他的文章《上班就是上坟》脱不了干系。但是,当读过他的《考古者说》之后,读者会发现,无论工作还是创作,郑嘉励始终是严肃的、真诚的。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郑嘉励自1995年起,就供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多年的工作中,他曾参与各类古墓葬、古遗址的发掘和调查,在撰写学术论文和考察报告的同时,他将自己多年来的心得感受和对考古学科的认识,梳理成或长或短的文章,并将其集结出版,取名《考古者说》。

考古是一个专业性很强且比较冷僻的学科,对于任何一个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来说,大都希望关于考古的文字能得到读者的青睐,希望读者因为这些文字而喜欢考古这一学科,但要实现这种愿望,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加之考古类文字,多数囿于专业术语的堆砌和学术概念的阐释,从而使得原本鲜活生动的历史,可能会因考古术语的限制,而变得僵直生硬,无法让读者从中获得应有的知识滋养。

郑嘉励在长期的考古研究工作中,不仅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体系和思想框架,并能深入浅出地将考古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到读者面前,这是《考古者说》一书能够引起广泛好评的关键所在。在他的文章中,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有关考古的知识,如墓葬为什么要讲究风水,顺风顺水对墓葬有什么样的作用;墓志有怎样的固定格式,男墓主与女墓主墓志碑文的区别在哪里;界碑、警示碑、去思碑、戒石铭及摩崖题名展示的重点是什么,各自又有着怎样的特点等,而且在他的叙述中,读者还能读到许多生动有趣的考古故事,这些故事为他的文字增添了大量活色生香的内容,使得他的考古类文字,在保持客观性的基础上,多了亲切可近的生活气息。

在《考古者说》中,郑嘉励有意识让自己的文字摆脱专业学术气息的浸染,自觉脱离了学院派文体的文风特色。历史史料是考古类文字的根本,如何让史志特点的枯燥文字,转化为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乐于接受的语言,是考古类文字能否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郑嘉励以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在旁征博引中对考古学进行多视角的解析,既还原了历史的古老面貌,又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挥洒自如地展现着考古学的无穷魅力。特别是在语言风格的掌控上,更体现出难得一见的流畅与从容。如“古人收殓陌生人的骨殖,一半是因为敬重,一半因为恐惧。好比我们坐在台下,听主席台上的领导讲话,皆作洗耳恭听状,你说我们到底是因为爱他呢,还是因为怕他?”类似的文字在《考古者说》中随处可见,读过之后无不为其独到思维和形象比喻所折服。

郑嘉励没有一味用文字讨读者的欢喜,相反,他在行文考究研究成果和历史事件时,态度端正,行文严谨。考古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史实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考古来探索和确认历史的真相,这也是考古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之一。《考古者说》全书共有四个篇章,分别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每个篇章又包含若干篇文章,虽然篇幅不一,字数不等,但无一例外都是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对自己工作和感悟的记述。在这些文字中,作者能够始终尊重“史实”这一原则,对历史故事进行系统回放。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细微环节,每一个已有记载或无任何记载的历史痕迹,都逐一从他的考察研究中梳理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以讲解历史的方式,重点对浙江宋墓、宋元墓志、唐宋城市进行全方位的叙述,将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甚至传说故事和民间演义等,也都天衣无缝地穿插于文字当中,但所有文字的落脚之处,最终依然回归史料的真实和科学的严肃,显示出其严谨的史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底。这种写作模式,无疑开启了考古学的新天地,其文字所传达的思想,也许早已超越了考古涵盖的范围。

作为一本讲述与考古工作有关的文集,《考古者说》没有板着脸孔讲授什么是考古,而是以朴实无华、简洁洗练的文字,勾勒出考古学的概貌,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发现考古学的光彩和风华。那些深埋地下的冰冷古物,也许会因为郑嘉励的文字而焕发异样的璀璨和光芒。

《中古墓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吴桂兵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定价:298元

《考古者说》 作者:郑嘉励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定价:58元

中国古代墓葬中佛教因素发展的文化审视

——《中古墓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的考古学研究》评介

李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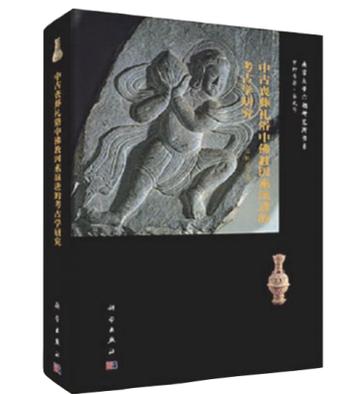
丧葬礼俗是中国古代非常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古丧葬礼俗最重要的变化是宗教因素的介入,道教与佛教因素丰富了上古以来以巫术信仰和儒教礼制为基础,以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丧葬观念,镇墓辟邪、往生轮回的观念逐渐支配于中古丧葬礼俗。儒家孝道观、佛教轮回因果观和民间道教的鬼神观念共同构架了中古时期的丧葬礼俗观念体系。南京大学吴桂兵教授《中古墓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正是通过对中古时期墓葬考古材料中佛教因素进入墓葬空间及丧葬环节的梳理来揭示墓葬图像与丧葬礼俗在中古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从选题之新颖、视角之独特、方法之考究方面来看,真可谓独具慧眼。

全书共84万字,除绪论外,分为八章,分别对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及西夏、辽代的墓葬图像及丧葬礼俗中的佛教因素作了爬梳及解读。涵盖对两汉以来至明清以前中国境内崖墓石刻、摇钱树座、陶俑、魂瓶、陶楼、铜镜、画像石(砖)、彩绘壁画、石椁、漆棺、墓志、塔柱、碑刻、舍利函、经咒、经幢等墓葬遗存中带有明显佛教因素的视觉图像演进脉络的全面整理与分析,对学界尚有争议的图像如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中的莲花白毫相像、孔望山壁画聚图、曹操墓“舍利”画像、南朝“竹林七贤”壁画墓中的“飞仙”图像、入华粟特人墓中棺槨及床榻上的背光神等也顺带进行了甄别,真可谓皇皇巨著。

此外,还对墓葬礼俗中的佛教因素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如唐代与丧葬礼俗息息相关的地上佛寺营建、墓地幢和塔的设置、随葬臂钏及下颌托、覆身安置陀罗尼经咒的殓式、吐蕃塔形墓营建、五代塔式罐、石灯台入葬、北宋皇陵和西夏帝陵中的寺院营建、宋代家族墓中较为流行的浮屠之法、辽代帝陵中陀罗尼经幢的安置以及辽代葬法中普遍流行的西天茶毗礼。

最后对整个中古丧葬礼俗中宗教因素的属性作了“儒释庄老尽穷旨趣”的结语,认为中古时期的丧葬本质上是在儒释道三教信仰的一个“名利场”,纵观全书体例宏大、内含丰富,细细研读便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写作特点:

一是通史体例,宏大叙事。该书主要立足东汉晚期至宋辽西夏时期的墓葬考古材料,以通史写作的体例详细梳理了中古时期墓葬空间及丧葬礼俗中的佛教因素,构建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墓葬佛教图像史。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分布极其宏阔,历史跨度逾千余年,地理分布包蕴南北,辐射边疆,遗存形式丰富多样,佛教因素与相关图像纷繁复杂。在浩繁的材料中能够披沙拣金,选取墓葬空间及丧葬礼俗中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图像及因素进行科学分期、分类,纲举目张,呈现出清晰的通史书写体例及时代演进特征。如南朝墓中流行天人、僧人与佛像题材模印画像砖;北朝墓葬的佛教图像多集中在“眠床雕户”般的棺槨葬具



上;隋唐时期地上的佛寺成为丧葬礼俗佛教活动表现的主要空间;辽代丧葬礼俗中流行经咒、经幢与西天茶毗礼。针对具体遗存信息的介绍则完全忠实于考古材料的表述,墓葬形制、尺寸数据、遗存位置、图像内容、榜题铭刻、保存状况的介绍及相关图版信息一应俱全,力求全面、准确。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以点带面,提纲挈领,构架了一部通史叙事的写作模式。

二是材料翔实,立论严谨。该书在以中原墓葬遗存为主要关切点的同时,也频频关注到边疆地区如高句丽、吐蕃的相关材料,为更加全面地展现本土墓葬中佛教因素的演变脉络,该书对域外相关材料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位于朝鲜半岛的德兴里、梅山里壁画墓、百济武宁王陵的相关壁画以及文献记载萧梁与百济往来的相关文献材料(第208—216页)。此外,作者对长江流域汉晋墓中出土的白毫相像的关注与讨论(第133—143页)也体现出其敏锐的学术洞察,早在2003年作者就曾发表《白毫相像与长江流域佛教早期传播》一文,专门探讨在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发现的一批墓葬白毫相像材料背后的宗教属性,认为长江流域各地三国至晋墓中出土的白毫相像是佛教在该地区早期传播的产物。

该书在翔实完备的材料和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特别注重墓葬考古研究的整体方法与空间分析,强调丧、葬、祭的一体性,力求在多元论据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立论,这是一种墓葬文化图像研究中难能可贵的整体观照意识。

如作者一直认为佛教因素从汉晋时期墓葬中的一件随葬器物,或者是一件随葬器物的一个组成部分,逐渐地影响到后世葬具的装饰、墓室的装饰、墓穴的营建、埋葬的方式,乃至地面用于祈福的佛寺、墓幢等(第542页)。

在对福建闽侯南屿南朝墓画像砖空间配置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其自下而上的布置显示

出经历了礼佛、不断飞升的过程,最终必然到达梵天净土的丧葬理念(第193—195页)。

通过对唐代陵墓附近营建佛寺或建在佛殿之下逼道宝塔以及葬俗中暂厝于佛寺或死后舍宅为寺的习俗方面的分析,得出了唐代佛寺与墓葬关系更加紧密,地面佛寺成为丧葬礼俗佛教活动表现的主要空间这一观点(第298页)。

通过对吐蕃时期陵墓地上建筑、墓内设施、随葬器物的综合梳理,认为吐蕃丧葬礼俗中的佛教因素遗存与苯教以及地方习俗存在关联,反映出佛教因素进入吐蕃丧葬礼俗的过程性和复杂性(第383—403页)。

还认为宋墓中的接引图内容虽不甚明确,但确实反映出一种往生净土的观念(第49页)。辽墓中的备经图是在墓室中营构一个诵经与礼佛空间(第504页),四壁遍布真言梵字的做法是想将整个墓室作为彰显佛法法力的空间(第512页),埋葬的方式按照西天茶毗礼,这种墓室中营建礼佛空间甚至将其变为彰显法力的地下世界的葬俗表象是中古丧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达到巅峰的象征。

结语中强调中古时期长期存在佛教因素在墓葬遗存中的“混合”状态,并分析认为:汉晋时期是佛教因素与神仙信仰的“混合”;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佛教因素与袄教等宗教因素的“混合”;隋唐以后至宋辽时期是儒释道三家信仰的“混合”,这一阶段的复杂性在于佛教与道教均出现了互相借鉴的情况,如星官既有道教的星官,也有佛教的星官,这种“混合”模糊现象会掩盖墓葬真正的信仰内涵(第534—543页),还强调在观察整个中古丧葬礼俗中宗教因素属性时,一定要注意墓葬中各种宗教因素间的这种“混合”状态。

诸多的观点都印证了太史文关于做功德的认识:在中国中古时期,做功德并不局限在某一特定仪式,而是整合所有仪式的结果,其中就有东亚最重要、最完备的仪式,这就是安置尸体的葬礼,以及其后的持续四十九天乃至死后多年的纪念活动。

这种整体观照意识还表现在作者对文献材料的整体认识。因为有一些墓葬案例是在墓主丧葬活动实施的丧或祭的部分有佛教参与的可能,但是在葬的部分(即墓葬遗存)中却未能显现出点儿的佛教因素,如此一来,对墓志、历史文献中确载的墓主宗教信仰信息的捕捉就显得非常必要,但是无形之中也扩大了该书的研究对象,使得墓葬佛教因素演变的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而全面。此外,本书在立论过程中还非常重视空间分析的方法。如探讨四川地区摇钱树佛像时,作者强调应当关注其位置处在一个向上飞升过程中的一环,这种注重遗存空间的分析方法,使简单的器物延展成复杂的结构及组合,平面的空间变成了仪式进行的立体场景。与整体观照的研究意识相比,空间分析强调考古材料的位置及组合,更偏向一种研